



1913年某日，缪荃孙找到刻书家陶湘，出示了一部大书《儒学警悟》，全编分为六册（七集）41卷，即《石林燕语辨》《演繁露》《懒真子录》《考古编》《扪虱新话》《萤雪丛说》，均为宋人学术笔记，内容涵盖宋代典章制度、名物考证、科举应试等。

缪氏说，这部书刊刻于南宋嘉泰二年（公元1202年），辑印者为俞鼎孙、俞经。由于此书原刻久佚不传，仅以抄本传世，所以世所罕见。《永乐大典》曾辑录此书中的内容，但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可知，当时《四库全书》的编者仅知道有这部书，却不知道编者为何人，更不知道它是丛书。

缪荃孙见陶湘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为何要将《儒学警悟》这部号称“丛书之祖”的稀世钞本托付于陶湘？这部丛书最终出版了吗？

早在1892年，有山西书商出示一部《儒学警悟》明代钞本，引起了缪荃孙的关注。当时缪氏正在研究《石林燕语辨》，因此更急于见到《儒学警悟》中的钞本。但缪氏参与竞购未果，最终此书被藏书家盛昱抢先买去，秘不示人。

盛昱是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肃武亲王豪格七世孙。缪荃孙与盛昱、沈曾植有“谈故三友”之称，交谊颇深。

当时缪氏曾向盛昱借观原书，盛氏仅抄《石林燕语辨》一帙送给缪氏，而未许他见到原书。《艺风藏书记》写道：“荃孙求之至再，伯羲为钞《石林燕语辨》，畀小门生叶德辉刻之，未见全书。”

几年后，盛昱去世，其家中藏书不断散出。此时缪氏居于上海，他写信嘱托在京的傅增湘留心关注《儒学警悟》原书去向。最终，傅氏在宏远堂书肆发现此书。他在《校刻〈儒学警悟〉跋》中写道：“时宋元刻本之有名者，率为朋辈分携以去，此书以名字黯淡，巍然存于宏远书肆，乃以重值收之。”（《藏园序跋选录》）

1913年，缪氏去见陶湘的目的，正是准备用几年时间，认真校勘此书，再请陶湘刊刻出版。陶氏欣然应允，在日记中记道：“是年，江阴缪艺风氏有明嘉靖间王良栋抄宋本《儒学警悟》七集，实为丛书之始，至今绝少流行，洵孤帙也……原为宗室盛意园所藏，转藏于缪氏，今由缪氏归予，且详校撰序，授湘付梓。”

1919年中秋时节，缪荃孙整理好书稿，写好序言，将其交到陶湘手上。此后未及3个月，缪氏遽归道山。

陶湘不负所托，于1922年将此书刊刻完毕，并在日记中记道：“今岁工竣，先生归道山已三载矣，为之泫然。”1924年，又由北京文楷斋精刻，用存世珍稀的开化纸刊印。傅增湘在《校刻〈儒学警悟〉跋》中写道：“今兹得艺风一言而拔之沉霾之中，又得兰泉一念而播之海寓之内，而余得以微力周旋其间，不可谓非是书之幸遇也。”（《藏园

序跋选录》）

一部宋代私家刊刻的书，历经岁月摩挲，千回百转，最终在缪荃孙手上得以保存与流传，实属不易。那么，缪氏何以如此看重此书呢？

答案无外乎两点：一是它的版本价值，前文已略加谈及，此处不做系统介绍。二是缪氏认定，《儒学警悟》是我国真正的“丛书之祖”，即最早的丛书。

为进一步理解缪氏的论断，此处需要做几点说明：

其一，何谓丛书？对此早期的界定颇为混乱。在后来的观念中，丛书专指在一个名目之下，将多种著作汇编在一起。如清代叶德辉称，“丛书举四部之书而并括之，诚为便于购求之事。”（《书林清话》）正是此意。商务印书馆在编印《丛书集成》时进一步指出，我国丛书名目的使用，有一个变化过程：首先是有丛书之实而无丛书之名的书，如宋代俞鼎孙、俞经《儒学警悟》，宋代左禹锡《百川学海》；再者是有丛书之名而无丛书之实的书，如唐代陆龟蒙《笠泽丛书》，只是一本个人笔记；最后是名实相符的丛书，“至若名实兼备者，实始于明程荣之《汉魏丛书》，而继以《格致丛书》《唐宋丛书》等。”（《辑印丛书集成缘起》）

其二，我国的丛书兴起于何时呢？今天意义上的丛书，最早出现在宋代，缪荃孙称：“唐以来有类书，宋以来有丛书。”（《儒学警悟》叙）前面提到，唐代出现的丛书，如陆龟蒙《笠泽丛书》，与今日丛书的意义不尽相同。

其三，《儒学警悟》明钞本出现之前，人们认为最早的丛书是哪一部呢？在缪荃孙判定《儒学警悟》为“丛书之祖”之前，人们一直认为，最早的丛书是宋代左禹锡《百川学海》。比如清代钱大昕说：“荟最古人之书，并为一部，而以己意名之者，始于左禹锡《百川学海》。”（《百川学海跋》）再者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论《百川学海》说：“左圭《百川学海》始兼裒诸家杂记。”（钱泰吉《曝书杂记》）叶德辉也称：“《百川学海》为丛书之祖。”（《郇园读书志》）

其四，何以认定《儒学警悟》是“丛书之祖”呢？主要是根据成书时间。据缪氏推算，《儒学警悟》较《百川学海》早出72年。缪荃孙写道：“近数年来，伯羲（盛

昱）所藏散出，以重价购得此书，始知俞成序为嘉泰元年辛酉正，前乎《百川学海》72年也……《儒学警悟》既为丛书之鼻祖，又为海内之孤帙，其中《燕语辨》一集更为《直斋》未见、《大典》未录之书，一旦复出，不可谓非人生之幸事也。”（《儒学警悟》叙）按：此中《大典》似为《四库全书》。叶德辉也写道：“宋人《儒学警悟》《百川学海》二者，为丛书之滥觞……《儒学警悟》目录后有嘉泰辛酉正吉十有五日建安俞成元德父谨跋一则。二卷有题识云：‘壬戌三月初有七日，承议郎前剑州通判俞闻中梦达刊之于家塾。’壬戌为嘉泰二年，《百川学海》前人考定为咸淳癸酉刻，则《儒学警悟》犹在前。”（《书林清话》）

其五，读书界如何看待丛书的价值呢？在传统读书人的心目中，“丛书”是一个很重要的门类。清代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即写道，“丛书最便学者，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，搜残存佚，为功尤巨。欲多读古书，非买丛书不可。其中经史子集皆有，势难隶于四部，故别为类。”按：《书目答问》署名张之洞，实为缪荃孙32岁时代笔撰写。

其六，《四库全书》为何没收入《儒学警悟》《百川学海》？首先，《四库全书》按四部分类，没有“丛书类”；再者，编撰《四库全书》时，馆臣似未见《儒学警悟》原书。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子部杂家类《石林燕语》条下案语写道：“《儒学警悟》亦南宋之书，不著撰人姓氏。”还有《四库全书》收书原则，“取其精者单行著录，不存丛书之名”。比如《百川学海》集书一百种，叶德辉记道：“《四库全书》所收唐、宋人小书，大半析此书（《百川学海》）分隶各部，各家藏书目往往有单种影钞宋本，亦不外此书残缺，非真有宋刻单行本也。”（《郇园读书志》）

■ 人物小传

缪荃孙（1844年—1919年）

字炎之，江苏江阴人。历任国史馆纂修、总纂、提调等职，后主持创办江南图书馆、京师图书馆。1915年，受赵尔巽之聘赴京任清史馆总纂。

缪荃孙一生著述颇丰，与王闿运、张謇、赵尔巽并称清末民初“四大才子”。在藏书与版本目录研究方面，缪氏堪称一代宗师。

中国丛书佚闻

■ “丛书”一词源自何处？

“丛书”一词，最早出现在唐代韩愈诗《剥啄行》中：“门以两板，丛书于间。”本义为聚集的书籍。而唐代陆龟蒙的《笠泽丛书》不但以“丛书”命名，还在序文中定义道：“丛书者，丛胜之书也……歌诗赋颂，铭记传序，往往杂发，不类不次，混而载之，得称为丛书。”这里把“丛书”定义为诗文集的别称，与今日丛书之义不同。

■ 孰为“丛书之祖”？

关于“最早的丛书”，除了前文提到的《儒学警悟》和《百川学海》外，另有观点认为，北宋官版《大藏经》，即《开宝藏》为最早。

此书于开宝四年（971年）开始刊刻，历时12年，于太平兴国八年（983年）刻毕。共刻书版13万块，收大小乘佛典及圣贤高僧集传1076部，5048卷。

■ 近代最重要的丛书有哪些？

《四部丛刊》，1919年至1936年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等辑印，出版初编、续编、三编，共收书477种，凡11921卷。

《四部备要》，1920年至1936年，中华书局陆费逵等编辑排印。共收书355种，线装2500册。依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，用杭州丁氏所藏仿宋体铅字排印，个别影印。

■ 谁首先提出“文库”等同于“丛书”一说？

将“文库”等同于“丛书”，据称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首创。

“文库”的英文是Library，兼有图书馆与丛书两个意思。1929年，王云五组织出版《万有文库》，最初命名为《千种丛书》，后改“千种”为“万有”，改“丛书”为“文库”，即称《万有文库》。

《万有文库》全书共分两集，收录图书1721种，4000册，涵盖国学、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等领域。

■ 谁首先提出“文库”等同于“丛书”一说？

将“文库”等同于“丛书”，据称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首创。

“文库”的英文是Library，兼有图书馆与丛书两个意思。1929年，王云五组织出版《万有文库》，最初命名为《千种丛书》，后改“千种”为“万有”，改“丛书”为“文库”，即称《万有文库》。

《万有文库》全书共分两集，收录图书1721种，4000册，涵盖国学、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等领域。

将“文库”等同于“丛书”，据称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首创。

“文库”的英文是Library，兼有图书馆与丛书两个意思。1929年，王云五组织出版《万有文库》，最初命名为《千种丛书》，后改“千种”为“万有”，改“丛书”为“文库”，即称《万有文库》。

《万有文库》全书共分两集，收录图书1721种，4000册，涵盖国学、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等领域。

与《越缦堂日记》比，是“自赏”与“自省”的分野。李慈铭才气纵横，其日记几乎当作传世著作来写，时时流露出对自己才学的矜持与对世人的苛刻。郑天挺则完全抛却了“供人阅读”的预设，日记是为观照自身言行，故而记举债时遭人冷眼的屈辱、苦撑危局时的力不从心，毫不矫情。李慈铭如揽镜自照，郑天挺则如对镜刮骨，真诚度与内省力似乎更胜一筹。

这是从“史料库”到“心灵史”的位移。翁、李日记是研究晚清政治社会的富矿，郑天挺日记的影响则在于展现了“现代学者”的人格养成。它告诉我们，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早期，学人如何通过“无恒产而有恒心”的读书维系文明火种？如何在日常琐碎中修炼品德，进而挺立为“北大舵手”？这种强烈的修身意识与坚韧生命力的展示，让日记的影响从史料层面上升到了精神感召层面。

《郑天挺北大日记》是学人留下的厚重的私人档案。在这里，我们见不到粉饰与传奇，只有一个真实的人在账簿、书单、病痛与别离中认真活过的痕迹。他用日记证明，高级的“活人感”不仅是有血有肉的生活还原，更是一种“以记规德”的清醒自律。当郑天挺在灯下搁笔，为一日之言行作结算时，他不仅留住了那个远去的时代，更以极致的坦诚，成全了日记这一文体的价值——让人在历史的激流中，活成一个真正的人，一个不断自我革新的、大写的人。

书市观澜

近代实业家传记迎来销售潮

姚雪痕

近年来，影视联动早已成为图书市场的重要增长引擎。《太平年》《借命而生》《主角》等由原著小说改编的热播剧已形成一套成熟模式：影视剧热度直接转化为原著小说销量，虚构文学单品迎来短期爆发。

然而，央视一套播出的历史正剧《江海潮生》，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径。作为一部无原著小说的主旋律影视作品，《江海潮生》没有催生同名原著热销浪潮，而是激活近代史人物传记、实业史料、地域文史等领域，开辟了影视带动图书出版销售的另一条路径。

剧集上线后，无论是线上电商平台，还是线下实体书店，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——张謇》《张謇新传：状元实业家的跨界传奇》《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（1896—1907）》等传记，一手史料图书的搜索量、询单量迅速走高。观众不满足于屏幕上的艺术化演绎，转而通过阅读相关人物传记、历史背景等，了解张謇实业救国的艰难求索。不仅如此，还带动了晚清民族工业、近代实业家传记等通俗历史读物销量升温。实体书店抓住这一契机，纷纷设立张謇与近代实业专题陈列区，举办相关主题读书会，推动影视流量转化为图书消费。

长期以来，近代历史、实业救国等图书传播渠道相对狭窄，受众圈层固化，市场传播力不足。而《江海潮生》引发的市场表现证明：没有原著支撑的历史正剧，同样能够激活长期沉寂的纪实、传记类图书赛道，而剧集热播窗口期，正是这类读物最好的推广节点。面对激增的市场需求，多家出版机构第一时间启动张謇相关存量著作重印，并加快策划而向大众的通俗普及版传记，通过简化学术注释、优化叙事节奏，降低阅读门槛，填补大众文史读物市场空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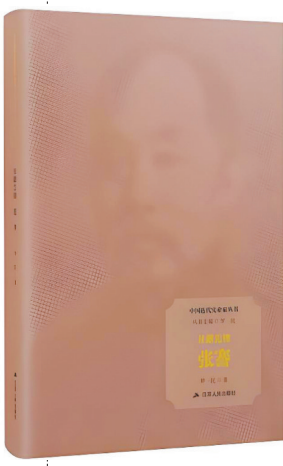
渠道端也随之产生了细微但持续的变化。线下，以往实体书店设立影视热点专区，陈列重心多为剧集原著小说，如今书店常态化设置历史正剧配套文史专题区域，陈列传记、档案史料、地方文献等读物，拓展了影视热点专区图书边界。线上，直播间、文史博主截取剧集片段搭配史料解读，带动非虚构图书零售增长。

在相关图书热销的同时，也需理性审视其中存在的局限。历史正剧受众以中老年群体为主，向年轻群体渗透力度有限；缺少同名原著作为流量承接载体，相关图书难以形成现象级单品爆发；受影视剧热度周期性限制，若缺少持续的研学活动助推，热度消退后，相关读物销量或将逐步回落。

从行业长远发展来看，《江海潮生》拓宽了书影联动的想象边界。今后，出版机构布局影视联动营销，不必只是紧盯可供改编的长篇小说IP，而是提前关注重大历史题材原创剧集，梳理剧中历史人物史料、地方文史文献，同步剧集播出档期策划铺货、联动文旅资源，打造“影视+图书+文博研学”营销模式。

可以说，历史正剧的文化价值，正在图书市场得到清晰印证。《江海潮生》带来的市场效应不只是一轮短期图书热销，更是一次重要的行业实践。它为非虚构文史图书、主题出版找到了一种全新的传播渠道，推动出版行业重新思考视听内容与纸质阅读的共生关系，为历史正剧与图书市场双向赋能，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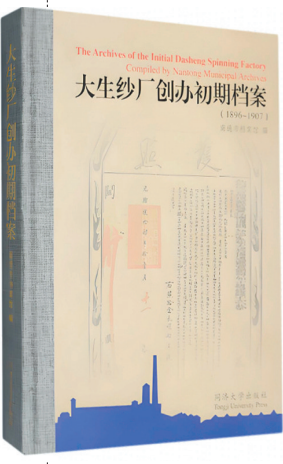
■ 荐书



《开路先锋：张謇》
江苏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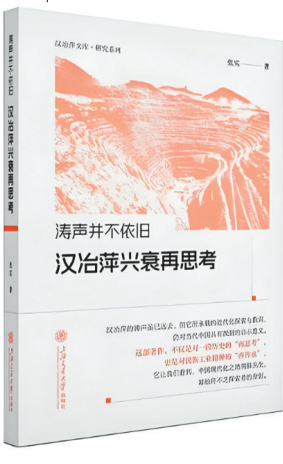
全书系统梳理张謇一生，讲述其以状元之身弃官返乡，创办大生纱厂、通海垦牧公司、博物苑，打造“中国近代第一城”南通的完整历程。

对照《江海潮生》剧情，本书能够帮助读者区分艺术虚构与历史原貌，读懂剧中人物抉择背后的时代困境，是走近真实张謇的优质通俗读本。



《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（1896—1907）》
同济大学出版社

书中收录的股约、账册等档案是大生纱厂创办初期十年间经营管理活动的原始记录，先后入选《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》《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》，完整还原了张謇募资建厂、艰难运营的全过程。作为一手文献，印证了《江海潮生》剧中张謇筹股受挫、多方周旋等情节。



《涛声并不依归——汉冶萍兴衰再思考》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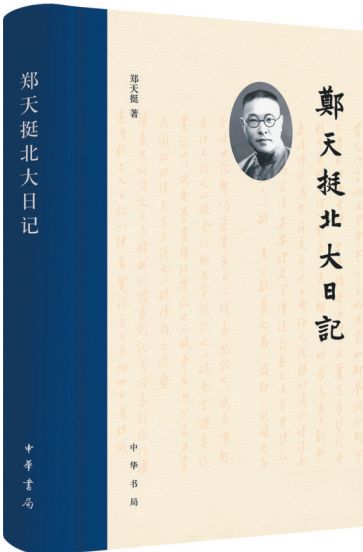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梳理汉冶萍从创办、扩张到受制于外债走向衰落的全过程，辨析盛宣怀经营困境、中日资本博弈等史实，还原清末官督商办弊病、外资渗透危机，解释了张謇极力抵制汉冶萍中日合办的深层缘由，帮助读者理解张謇兴办大生纱厂这一选择背后的时代挑战。

在流水账中打捞一代学人的身影与心事

■ 提示

在当代语境里，年轻人常将那些不端着、不造作、充满生活细节与真实性情的人或作品称为具有“活人感”。若以此标准衡量近现代学人日记，《郑天挺北大日记》无疑是一个代表。这部中华书局新近推出的珍贵文献，不仅记录了郑天挺在北大前后近30年的行止，更像一部未经剪辑的近现代知识分子生活纪录片，坦诚得令人心惊。

当我们将其与晚清、近代的日记双壁《翁同龢日记》与《越缦堂日记》相对照时，一种走向“心灵的完全裸露”的文体进化感便跃然纸上。



心力交瘁却始终坚韧

《郑天挺北大日记》最动人之处，在于它毫无保留地呈现了学人光环背后的肉身沉重。这种真实感，并非电影《楚门的世界》中被窥视的无知，而是一种主动的、自省的全面剖白。

日记中最具“活人感”的一幕，莫过于郑天挺受表兄梁漱溟之邀南下广州前的窘迫。上世纪20年代初，北大正面临经济凋敝，薪水久拖。作为年轻教员，郑天挺竟需为家计举债，月息高达二分，借贷过程中还备受羞辱。这种被钱难倒的狼狈，让这位学者大师饱受时局多艰之苦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郑天挺苦撑北大残局，转移学生到西南联大；1946年后重建北大，郑天挺竭尽所能，在繁重工作与丧女之痛中挣扎……种种细节共同拼凑出一个心力交瘁却始终坚韧的“北大舵手”形象。

这种真实，还藏在郑天挺琐碎的买书记录里。他频繁记下购书花费与米面价格，将个人精神生活与市场物价的波动挂钩。物价腾贵，书资所占比例便受挤压；时局稍稳，案头又添新籍。这些流水账般的数字，恰是时代变局打在日常生活上的烙印，比任何宏大的经济史论述都更具体温。

对内修身克己对外记录时代

郑天挺的日记绝非简单流水账。1928年8月18日，29岁的他在日记中明确了撰述宗旨：“心境喜怒哀乐，记之以观吾

华 筠

德；起居行止，记之以观吾行；师友言谈，记之以观吾言；读书作业，记之以观吾学；书牍往还，记之以观吾交游；他若日常见闻、政治得失，亦并志之，以观时局之递变。”这段宣言揭示了日记的双重价值：对内是修身克己的明镜，对外是记录时代的底稿。

在“观吾学”上，他展现了惊人的定力。无论校务多艰、生计多迫，每天坚持读史。36岁前后，他反复啃读《说文》《清史》《资治通鉴》等硬核经典，且版本校勘不辍。这种“扎硬寨、打死仗”的功夫，在学术求索上尤具镜鉴意义。

在“观时局”上，他的笔触冷峻而克制。通过记录与梁漱溟、蒋梦麟、胡适、傅斯年、刘半农等师友的往还，将一幅20世纪上半叶学术更迭与学人命运沉浮的画卷徐徐展开。刘半农外出考察染病早逝、同仁伤病的细致记述，让历史不再是干瘪的词条，而是充满了生命的遗憾与悲怆。

从“史料库”到“心灵史”的位移

郑天挺日记的价值何在？近两年除《郑天挺北大日记》外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两卷本的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，影响颇大。

将《郑天挺北大日记》置于近现代日记史脉络中，方能凸显其独特价值。与《翁同龢日记》《越缦堂日记》相比，它们恰好代表了三种路向。

与《翁同龢日记》相比，是“在朝”与“在学”的距离。晚清翁同龢身处权力中枢，其日记关乎军国大政、帝后关系，落笔多有顾虑，有时在不经意间已作删削修